

智慧之门

庄子

○ 安继民 高秀昌 注译



中州古籍出版社

智慧之门

庄子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庄子/安继民,高秀昌注译. —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6.1

(智慧之门)

ISBN 7-5348-2522-9

I. 庄… II. ①安…②高… III. ①道家②庄子-注释
③庄子-译文 IV. B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7920 号

责任编辑:卢海山

责任校对:牛冰岩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5.5

字数:345 千字

版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7-5348-2522-9/G·614 **定价:**22.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前 言

读《庄子》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但如果你一旦意识到人生的一些基本问题,甚至在内心深处充满着对这一问题的探求的渴望,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庄子不仅能让你轻松下来,甚至可以说是你最好的伴侣。所谓人生基本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宇宙起源、人类起源这一类披着科学外衣的宗教神学问题,具体地说,就是每个人在十岁左右的时候,就会突然有一天意识到: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的人早晚有一天都是要死的。所以,上世纪后半叶勃然兴起的存在主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就是把人理解为一种面向死亡的存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庄子思想其实正是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诉说着神学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它能够对印度初来的佛学理论的消化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曾经构成了魏晋玄学的主旋律并直接影响了整个的传统文学艺术。台湾学者涂复观的《中国艺术精神》除了一章写孔子外,剩下的绝大部分就是在写庄子。宋代思想家叶适评价庄子道:“自周之书出,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胡文英认为,和屈原相比,屈原的忧患在一国,庄子的忧患在天下;屈原的忧患





在一时,庄子的忧患在万世。鲁迅认为,庄子凭着他文风的汪洋恣肆、仪态万方,影响甚巨,这使得道家思想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根底。闻一多认为自魏晋以来,中国文化中永远留下了庄子的影响。当代哲人金岳霖十分推崇庄子的思想,他1942年用英文所写的《中国哲学》一文中这样评价庄子说:“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在庄子“这种怀疑主义里,可以说希腊的明朗渗进了希伯来的美妙,希伯来的美妙软化了希腊的明朗。有幸接近这种理想的人会妙趣横生,怀疑主义并不使他尖酸刻薄,美妙也不使他冒冒失失地勇往直前”。这里所谓的希伯来的美妙和希腊的明朗,说白了其实也就是希伯来的神学和希腊的科学。而按罗素的说法哲学正处于宗教和科学之间的“无人之境”。崔大华先生在评价庄子思想在民族文化中的历史作用时说:“庄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发展演变中最活跃的、不衰的观念因素,也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解、消化异质思想文化的最有力的、积极的理论因素。”为什么庄子思想能够如此地活跃且经久不衰?不就是因为庄子所关注的是一类人们永远不得不面对的人生基本问题吗?所以,庄子的思想并没有死,她至今仍然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之中,也就是说,庄子似乎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因为不管你读不读《庄子》,事实上你总是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去面对庄子曾经深入思考过的人生基本问题。用庄子的话说,这是每个人都“无所逃”的天性。

不仅庄子所面对的问题具有独特的魅力,而且庄子的叙述方式也与众不同。况且,庄子是人不是神,他是以哲学的方式讲述着

类似于神学的“问题”。如果所有的“真问题”都是有关于人的问题,那么,一旦要讲述你的“问题”,就要结合生活事实说一些人人都会面临的“真问题”,有了“真问题”,才会在其中享受到真正的思想乐趣。否则庄子也就不再是一个哲学家了。

如果你想浅尝辄止,我建议你读一下《逍遥游》、《秋水》就行了,那里不仅充满着美妙的想象,而且文字优美,意境弘大,读来让人回肠荡气,爱不释手。年轻人都喜欢《西游记》,在这里,你能体验到孙悟空的变幻莫测。不过,它毕竟不是小说,诚如金岳霖所说,你在这里既要用理智又要用感情。这大概也正是他的魅力所在吧!如果你还想对庄子有进一步的了解,你可以读《养生主》和《盗跖》,这两篇能够让你体验到生命的乐趣和自由的气息。人就是要过像庖丁那样的生活,活得游刃有余,从容自得;虽卑微如一个宰牛人,仍然能够通过技艺的娴熟而进于大道之境。人当然也要会像盗跖那样,敢于在必要的时候骂人,而且骂得极有水平,让权威如孔子者也不得不自叹不如。你当然也可以读一下《说剑》,尽管据说它没有什么思想性,但因为它的文风和情节都无异于金庸的武侠小说,充满夸张之能事,作为消遣,也是值得一读的。

再要读下去的话,那就要看你想干什么了。正如叶适所说的那样:“世之悦而好之者有四焉:好文者资其辞,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遣其累,奸邪者济其欲。”说白了就是,社会上有四种人喜欢读庄子的书,喜爱文学艺术的人,是要在庄子这里找一些好词句和写作的技巧;寻找真理的人,是要在庄子这里体验得道的美妙和对人生的透脱理解;被世俗的忙碌搞得太累的人,可以在庄子这里得到精神上的休息;而想做坏事的人,也可以在庄子这里找到做坏事的理由。“好文者资其辞”的例子真是太多了,鲁迅、毛泽东的文章中经常能看到庄子的身影,蒋介石督导刚从苏联回来的蒋经国要





好好补补国文课,推荐的就是《论》、《孟》、《庄》、《骈》四部书。“求道者意其妙”当代有一些故事新编之类的事,董光璧的《当代新道家》就是专门讲述日本诺贝尔奖得主汤川秀树、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英国人李约瑟和道家庄子之间的故事的。汤川秀树说他得诺贝尔奖的成果灵感就是受庄子“儵与忽相遇于浑沌之地”的启发。什么是“泊俗者遭其累”呢?这对当代人最为近切。中国人从来注重对功名利禄的追逐,但任何事业都有成功不成功两种可能。当代中国人的利益追逐已经达到疯狂的程度,成功的当然是接着疯狂就是了,每天都过狂欢节,岂不快哉!但偏有一些人,当狂欢一阵子之后,觉得这也没什么意思,这时候,你大概就可以在庄子中得到一些宁静的休息。真正受到触动的,或者会拿出一部分的钱,到山沟沟里接济几个可爱的穷孩子,发展一下中国式教会的慈善事业。如果失败了,被无情的竞争淘汰出了局,庄子会像一个善解人意的老爷子,告诉你原来所追求的目标本就算不上什么,于是你也就在心理上宽解了许多,不再痛心疾首,不再悔恨得想跳楼。最有趣的是“奸邪者济其欲”,有人不免会问,庄子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么?他为什么会帮助那些“奸邪者”呢?

这句话就正经问到了点子上。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曾经将《庄子》外、杂篇分为三类,其中一类他称之为“无君派”。什么是无君派呢?其实庄子是认为“无适而非君”的,无君派并非庄子的嫡传派系。无君派的主旨就是要对君主进行无情的批判,用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话说就是“造反有理”。我上面推荐的《盗跖》当然是其代表作之一,此外,《骈拇》、《马蹄》、《胠篋》、《在宥上》、《让王》、《渔父》都属此类。这些篇章中对所有的统治一概予以批判,大有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意趣。人们熟知

的当然也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为大盗”。按照庄子的意思，人本来都有能力按其本性好好地活着，他们都有自治的能力，在传统的农业社会中，“自给自足”的乡村自治其实也是一种常态。你皇帝、官老爷们要对其统而治之，说轻了是多余，说重点儿就是罪恶。这里讲的还不是老子式的“无为而治”，而是认为人在天性上根本就不需要什么外在强力的所谓“治”。西方人作为海洋文明类型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发展了相当丰富的商品经济，近代以来市场经济大兴其道，就开始说什么“管事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这其实就是承认了民间的自治、组织能力的合理合法性。中国历史上，儒家的地位从来就显赫得很，之所以如此，就因为汉武帝以后对儒家思想大加提倡，把它抬到国教的地位。隋唐之后科举制广泛推行，1313年蒙元帝国的统治者将朱熹所注的《四书》钦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教科书，此后的整整六百年时间，中国人就读这么一本教科书。于是儒家中的末流小辈们便把儒家的经典著作当做了“敲门砖”。金榜题名登科及第乃至作了进士成为天子门生之后，更是非同了得。但许多人其实并不傻，据说有不少人就偷偷地在背地里读《庄子》，而那些名落孙山，在竞争中落选的毕竟又是多数，这时候如果他悟性好，智商高，就有可能在庄子那里寻找精神寄托。不管是唐诗还是宋词，特别是明清以来大量出现的笔记小说，民间戏曲文学其实也都在《庄子》中汲取了营养。更重要的是这几篇无君派的著作，对任何形式的统治合法性一概提出了挑战，这就为改朝换代的英雄豪杰们提供了思想武器。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主要就受了老庄道家的思想滋养，直到后来的白莲教、义和团乃至各朝各代的“农民起义”，凡是能成点气候的其实大多和庄子式的“造反有理”思想观念有关联。

中国虽然没有欧美那样经过高级知识分子整理过的一神教，





可民间宗教,万物有灵观念则是所在皆是,极为深入人心,这都和庄子道“无所不在”的思想观念有关。道家理想中的“小国寡民”乡村自治生活之所以得以维持,其精神上的寄托就来自于庄子对大自然的赞美,正是对自然的热爱才保持了我们这个民族几乎是无限的活力。林语堂说,儒家是中国人的都市哲学,道家是中国人的乡村哲学。应该算是说到了点子上。但林语堂晚年还说,老庄道家 and 耶稣在精神上是兄弟。这也说明了东西方文化不管在精英们的笔下多么天壤有别,但在深层次上,由于建基于共同的人性之上,因而它们在胡塞尔式的“生活世界”中总会多有相通之处。按庄子的观念说就是,自然界如此这般的存在而不是不这样存在,它事实上已经为人类的生活方式划定了一条天然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按现代的政治理念,对精英们所建构的社会秩序固然要时刻严加小心,但如果你放开来让人们都去自由,他其实也自由不到哪里去。大自然对人类自由的限制其实远远比任何统治者所规定的限制都永远强大一百倍。

刘笑敢所说的另一类就是《庄子》外、杂篇中的“黄老派”,外篇包括《在宥下》(刘氏认为《在宥》篇前面一大段属于无君派,已如前述;下面大部分都属于黄老派。所以将《在宥》篇一分为二为上、下两篇)、《天地》、《天道》、《天运》、《刻意》、《缮性》和杂篇的《天下》(《天下》篇是中国最早的学术思想史)。

什么是黄老派呢?就是以黄帝、老子命名的道家在春秋战国时期创立的以道家“无为”的方式来治理国家的道家进取派。虽然它们的方式并非一般人都能把握得住,但如果你真能理解了其中的个中三昧,那也确实是非常了得的大智慧。但我还是建议青年朋友们不要学习这种方法。因为这种方法没有相当的阅历和学养是相当难以把握的;弄得不好,你不但得不到进步的鼓舞,反而

会因为对其方法不得要领而让你的进取精神变成“走得快了赶上穷”的尴尬。但如果你是从政的人,可能会比搞经济的人理解得更好一些,所以如果有时间,有兴致,不妨就读一下也无妨。但如果你的理想不是太高,我劝你还是不读的为好,硬要读的话,你最好先读译文,看它对不对自己的胃口,如果对胃口,那就读下去;如果不对胃口,不读也罢。凡正道家的总精神是消极,你忙得不亦乐乎,看这种消极的东西干吗?但是如果你胸襟阔大,理想高远,那么你也许会在其中获得一些永远不会过时的人生大智慧,一言以蔽之:“无为而治”。老子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大大的丰富和升华。

《韩非子》中有两篇文章是有关老子的,一篇叫做《解老》,另一篇是《喻老》。李泽厚在《孙老韩合说》一文中对此大作文章,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在所谓“纯粹道家”的庄子这里,外、杂篇中其实已经露出了道家向法家过渡的端倪,那就是“君无为而臣有为”的观念。“无为”就是不作为,不作为就是不做事,但人们要生活,总还是有些事情需要做,如果人人都不做,那就真的成了庄子和耶稣都讲过的人不需要劳动也能生存下去的思想观念,像禽兽一样向大自然讨生活了。庶民百姓要为君子和王侯们提供物质生活资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不必多说;楚国不向周王室进贡白茅草,耽误了王室的滤酒从而影响了祭祀活动,就被管仲拿来借口进行讨伐。可见事儿还是要有人做的。但在统治者内部,一系列的管理活动该怎么办呢?在官场逻辑中,我们大家都知道:不干事,不犯错;干一事,总有错;干事越多,错误也就越多。于是,干着的不如站着的,站着的不如看着的,看着的不如玩着的。奇怪的是我们这个传统中有一种“内圣外王”的理想,这一伟大的理想虽然现在被新儒家炒得红红火火,但它的发明权却就在《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的意思是说,要想成为统治天下的王爷,先要成为聪





明睿智且道澹良善的圣人,而圣人是不能犯错误的。不仅中国如此,即使在古罗马共和向帝制的转换时期,关键且著名的渥大维在电影《罗马大帝》中也说过“做领袖的不能有弱点”的话,这说明传统的帝制逻辑大体上是一样的。成语“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逻辑逆运算就是:“一旦成了圣贤,也就不会有过错。”但统治天下的王爷毕竟也是人,怎么样才能让他没有过错呢?那就是啥事都别做,不做事就不会有过错。于是乎,“君无为而臣有为”的逻辑可以这样来理解,由于君主必须是不会有过错的圣人,所以他也就不能做任何事;因为只要做事,总难免被人挑出来毛病。而事情总还得有人做,那就只能让臣子们免为其难了。有了功归皇上,出了问题拿做这件事的臣子顶上去,熟悉中国历史的人对此想来不会陌生。西汉的晁错有什么错?他不就是主张“削藩”吗!况且是你景帝亲自批准了的合法的事情;但一旦“七王”发难,汉王室前线吃紧,也就只得拿晁错的人头顶一阵。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事就交给喜欢历史的读者自己去读去想吧!

刘笑敢所说的第三类也是最正宗的一类就是所谓的“迷庄派”,外、杂篇中的迷庄派是以《庄子·内篇》作为标准的。《秋水》是其代表作。至于庄子的魅力究竟在哪儿,我一开始已经说到了,但那是在和欧美宗教神学相比较的语境下所说的话。但如果仅仅如此,那就把中国传统的农耕文化和欧美的商业性海洋文化完全混在了一起,大错特错了。既然中国文化有着十分鲜明的个性,以至于能够“以哲学代宗教”,而庄子又是传统文化中一颗耀眼的明星,我们有必要深入其内里稍作徘徊。没有兴致的读者当然可以就此罢休。《庄子·内篇》有七篇,王博最近有一本《庄子哲学》专就讨论这七篇,按他的理解,核心思想是“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窃以为抓住了庄子思想的关键。有兴趣的读者不妨一读。

罗素认为,一本厚书就是一场大罪。我无意于强化我们特别是我本人的罪孽。如果你对佛教的“人生苦海”说和基督教的“原罪”说心存芥蒂,那最好就别读《人间世》和《德充符》,因为这两篇写得太痛苦,我读了十几年了,认真读这两篇,还是时有受不了的感觉。况且按世俗的观念,它也有颇为费解的地方。但如果你心里也正好有点不痛快,不妨拿它作个伴儿;当你发现这个世界上还有比你更不痛快的事情被另一些同类承受着,你或许会感到轻松些。按马列主义的观点,宗教是一种鸦片烟,但据医生们讲,它也有麻醉和镇静的作用;两面性的东西当然就得两面说。印度发明的佛教认为,人生是一个大苦海,基督教特别是《新约》中认为,人生是一个做好事儿以便赎罪的过程,这似乎和国人的直觉体验太偏离,但如果没有一些社会功能,它是不会流传至今且在发达国家仍大有信仰者在的。《大宗师》、《应帝王》和《齐物论》,特别是《齐物论》,庄周先生是写得太难懂了。它们是专供金岳霖之类的“哲学动物”没事儿琢磨着玩儿的,也就是说,它主要满足人们的理性需要。我倒不是说读者诸君没有理性需要,所以劝你们不要读。而是说现在这样的社会人都太忙太累,而有许多事儿又不是靠理性能说清楚的,相反,带有宗教情怀的理性正好是要告诉你有许许多多的人类生存所遇到的基本问题靠理性恰恰不可能说清楚。所以,如果你要是寻找竞争取胜那一类的理性智慧,最好是去读一些“权谋学”之类的书;这些书前几年炒得很热,想来现在也不会缺。但那些聪明才智在《庄子》这里是万万找不到的。因为庄周老先生要告诉你的不仅不是怎么样才能取胜,反而是劝你压根儿就不要竞争。如果事实上你又不得不竞争,那你读它干吗?人类喊了一百多年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我们伟大的胡适之先生也赶时髦因此而自名,但正如他的姓氏所表现的另一种意思那样,按





《庄子》的观点,那也真是“胡”适之。如果你还相信“世间自有公道”,那就千万别再“胡”适之。老子有言:“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就这个意义上讲,胡适之一再讲述的少年时读范缜的《神灭论》之后,也就不怕鬼了的故事,实在证明他算不上什么“上士”,这方面,唐德刚在《胡适杂忆》中已经臭过自己的老师了。我没资格再说什么!

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一元、自因性的时间哲学。所谓“一元”,是指中国人没有一个超越的本体,是一种可称之为“一重化”(吴重庆)的以“生活世界”(胡塞尔)为中心的文化。如果这样说还是太学术,犯学究气,我们可以换一种说法,那就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太认真地想过死后能不能上天堂的问题,同时当然也就并不在乎什么下地狱。人死如灯灭,活着干,死了算!中国人在这一类问题上从来并不太较真,原因有很多,从孔夫子开始就采取一种“祭如在,不祭如不在”的非逻辑态度,到了庄子这里,可以说是发挥到了极致。“形莫若就,心莫若和”,你说我是牛是马都没关系,委运任化,与物委蛇。只要我心里高兴,外人怎么说我们大可以不太在乎。胡适之先生有一篇小文好像叫《差不多先生的影子》,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其实早期中国似乎也有较真的,那个整天想着天一旦塌下来该怎么办的“杞人”不就是这类人吗?可我们早就用一个颇有感情色彩的成语“杞人忧天”,把这类人的所有求知冲动一瓢冷水给浇灭了。我们有着自己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但它不是忧天,而是忧国忧民。这虽然无可争辩地导致了中国没有发展出近现代理论形态的科学,但世界上没有哪一个民族不承认中国人聪明,甚至连公认为聪明过顶的犹太人也常常如是说。中国人的聪明没有耗在宗教和逻辑、科学的较真儿上,却把能量发展

到了“做事”上。我向来认为中国人是很会做事的,远的不说,只就这二十多年来中国人改革开放的业绩你就不得不承认中国是善于做事的民族。许多人都误以为老庄道家的“无为”就是不做事,实在是大谬不然,真正能做大事的其实注注都是颇得老庄道家精髓的人。儒家一天到晚地说什么要“忠君报国”、“孝敬父母”,其实如果你完全当了真,又注注是一个不会做事的“腐儒”,除了“平日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外,什么事情也不会做。刘邦的参谋总长张良,刘备的大军师诸葛亮,朱元璋的幕后策划者刘基,其实都是道家色彩极浓的人物。在中国式的生活世界中,这可都是些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大腕儿。

从学理上说,马克思认真讨论过一元、二元的关系的问题。那就是世界的神创说和自然而然说。显然,欧美人至少在达尔文之前是完全主张神创说的,而中国人从来就是主张自然而然的说的。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外部的创造者,而是从来如此永远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用庄子的话说叫“始卒若环”,“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这就是一元论,这就是自因说。这种一元、自因的学说,就来自于对时间的循环性理解。后来佛教来了,说是人可以“转世”,用阿Q的话说就是“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熟读过庄子的魏晋人士马上就欣然地接受了。到了慧能的禅宗那里,佛教已经被道家化了。玄奘的逻辑严谨的“唯识宗”之所以大道不行,就因为它太复杂,太较真儿了。如果不是吴承恩在《西游记》中的渲染,我想国人怕是没有几个会知道,在中国的大唐盛世竟会有这么一个较真的傻帽儿和尚。

时间上的循环性认识,用几何学的术语就是把时间看作是一个“圆”,这种认识在《庄子》中就可以理解为“圆通”,中国人崇尚“外圆内方”型的人格,那“内方”很可能得自于儒家的“君臣父子”





原则,而所谓的“外圆”,简直就是庄子“形莫若就,心莫若和”的同义语,用《老子》的话说就是:柔弱胜刚强。既然天道是循环的,它就总要转回来,我守柔处下地在这里坐着干等,早晚会“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在中国春节的贺辞中对中国人“相信明天会更好”的信念大为赞赏,他大概是对中国文化似懂非懂地若有所悟了。许多人一看到《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会产生误解,好像庄子真的关心自然界的规律,追求科学知识了,李约瑟写《中国科学技术史》对这种认识推波助澜,实际上是进一步造成了更为深刻的误解。《庄子》中的“天”注深处说就是“天道”,实际上经常就是循环性时间性观念的传统说法。庄子当然是关心天道问题的,但他立即就明白在终极的意义上人对大自然是不可知的。所以他虽然提出过远比屈原深刻的“天问”,却立即就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了惠施之类自然哲学家的任何可能的回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神童文化”。但正如孔融、仲永他们一样,小时聪明,长大未必了了。至少在今天看来,中国文化的命运就是这样。倒是庄子对儒家的另一种说法更有道理些,儒家人物大多是“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对“人心”的无知或者是佯作不知是宋明理学的最大痼疾,这就遭到了“心学”的反叛。所以有人比如牟钟鉴就认为,心学在本质上是道家思想。

时间哲学的伟大,可以从美国式的实用主义那里得到一些认可和证据。中国人改革开放主流的话语就是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释为“实践哲学”,这恰似李约瑟所说的黑格尔以来的“辩证法”在中国的命运,究其底里,是原本来自中国的东西在中国的复归。说得更通俗些就是,辩证法对中国人来讲只不过是“出口转内销”的东西。我曾经在火车上告诉一个旅客说自己是研究哲学的,

他立马就说：那不就是搞辩证法的吗？他太有不屑的神情溢于言表。这说明辩证法在中国人心中早已是某种“大众哲学”，和西方主流哲学完全格格不入。而所有这一切都以《易》学为骨架，在老庄道家思想中形神俱备。在科学而不是在神学的意义上，我同意爱因斯坦和卡尔·波普尔的意见，说世界是辩证的本身并不能为科学带来什么启迪。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读一下《天地》中子贡和灌园丈人的对话，就一定会承认李约瑟大讲什么道家特别是《庄子》中的科学精神是多么的不着边际。因为一旦把问题推向时间性地解决，你就等于坐等着什么都不干，虽然这样可以解决人在道德上的“纯白不备”问题，却与科学、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平等契约、法治精神宪政问题一概成了风马牛不相及的了。

但是，只要还允许哲学这门学问存在，你就不得不承认这样一种一元、自因、时间性的中国哲学是一种高明得像神学一样的问题。熟悉西方哲学史的人都知道，休谟之后而有康德，但直到罗素为止，“休谟问题”仍然被认定为“哲学的家丑”。所谓休谟问题，实际上就是时间问题。用欧美人的方式解决这类问题既然是无望的，除了诉诸信仰之外别无良策，那么中国式的阴阳辩证式的解决又何尝不是一条值得一试的途径呢？我们现在常说的一句话叫“与时俱进”，这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文化背景的一句话。虽然孔夫子有“逝者如斯夫”的话，但他的论证毕竟不具体。到了庄子这里，关于时间概念可就丰富得多了，光是“时”字在《庄子》中就出现过百余次，其中“安时而处顺”、“时命”等是庄学很重要的概念，而类似“与时俱化”、“与时消息”等表述也比比皆是。最为突出的是赵军在《文化与时空——中西文化差异比较的一次求解》中谈到的“时为帝”。在赵军看来，时间就是中国人的“上帝”。因为“从莱布尼茨到康德、黑格尔，这种时间意识都是不彻底的——彻





底的时间意识只有中国才存在,而彻底的空间意识则存在于地中海传统文化之中”。我一再强调中国人会“做事”,其实就得力于这样一种深沉的时间意识。科学到了这步田地,人类已经能够认识到,任何科学理论的潜意识结构都建立在某种信仰之上,因为根据哥德尔定理,所有的科学到了最后都依赖于某种假设或预设,如果没有对这种假设或预设性范畴的宗教般的信仰,所有的理论科学体系都无法发挥它应有的作用。而这些假设或预设是不能论证的。既然我们敬若神明的“科学”也不得不依赖于某种信仰,换句话说,科学需要通过对“时间会不断地来”(金岳霖语)这样一种信仰方式来支撑,那么被庄子所高度发展了的一元、自因性时间哲学也就会有着永恒的生命活力,而这也正是我们这个民族既深沉而又不失活力的观念渊源。

所以,我建议有“忧患意识”的年轻一代有心同胞不妨认真读一下《庄子》,其中确实有着太多的中国式“轴心时代”最伟大的东方智慧。

安继民

2004年11月1日于方外楼